

印尼峇里島華人族群現象：以客家社團組織為核心的探討¹

羅素玫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一、緒論：東南亞的華人族群現象與研究

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一書中，莊英章與簡美玲兩位編者對於當前客家研究的主要問題意識提出如此的定位：強調如何呈現出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客家族群是如何展現、維繫以及轉變的。兩位作者將客家研究置基於人類學學科訓練之上，強調全世界的客家族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經驗和展現他們的客家屬性。而現今各地區的客家現象，無論「蓬勃或稀微」，都需及時展開研究，以從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脈絡下來進行觀察。在臺灣，原本「隱形」的客家族群，自九零年代的族群運動與多元文化政策下，逐漸地「顯形化」，同時隨著文化觀光與懷古消費的興起，與以往不同的客家意象也逐漸進入俗民的經驗之中。而他們從臺灣的客家研究出發，提出了一個大方向的問題來面對當下的客家族群研究，即全球各地的客家認同如何在菁英論述與庶民實作之中交錯對話，這樣的作用又如何共同形塑出客家意象（莊英章、簡美玲2010：xxi-xi）。

在印尼的峇里島（Bali），客家族群與其他來自福建、廣東、海南、臺灣等華人族群，同時生活在這個印尼相當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島嶼上。在峇里島的歷史上，曾經流傳著來自中國的公主嫁給當地國王的故事，公主的墓也傳說仍在其最早居住的金塔馬尼地區（Kintamani）。荔枝這個水果，是跟其他中國元素像銅錢一起進入了峇里島的庶民生活之中。印尼華人特殊的適應背景下，國族形塑過程中所帶出的族群認同的氛圍，以及峇里島上印度教和華人宗教之間的相互匯流，都在峇里島模塑出一個值得特別獨立探討與華人族群相關議題的情境與研究問題。

根據廖建裕的研究，歷年來印尼政府往往把印尼華人當成單元體來看待，所以在

1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印尼「峇厘客家鄉親會」與島上諸多華人朋友的幫助，謝謝他們與我分享其家族在峇里島奮鬥與深耕的歷史。本研究獲得100年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千島之國中的「他者」：印尼峇里島的客家社群與族群現象」個人研究計畫經費的補助，特此致謝。文章初稿發表於2012年7月7日至8日「東南亞客家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與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辦，會議舉辦地點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定稿過程中，要謝謝三位匿名審查者對於全文修改的具體建議。也感謝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謝世忠教授能於百忙之中撥冗閱讀，並於研討會擔任評論人的現場提問。

政策上沒顧慮到印尼華人社會的複雜性，華人社會內部的歧異性可能是相當大的（廖建裕 2008：169-170），在他個人長期的研究中，著力探討不同歷史時期華人，在印尼國族形塑過程中的適應與面對的挑戰，另外，他也從政黨、文學、不同的宗教如儒教等面向去探討印尼華人的獨特性。

研究加里曼丹與蘇門答臘旁的邦加和勿里洞的Mary Somers Heidhues的幾部作品（1996, 1999），可以算是印尼華人與客家研究的經典之作。她所撰寫的民族誌的描述不但能深度紀錄與發掘出，客家移民在印尼的加里曼丹當地天然環境與社會族群背景下的當代歷史，此一研究亦可作為與其他如雅加達、棉蘭、泗水等地，均以華人為集中居住的城市族群適應現象來做對照。從印尼華人已有的研究來看，城鄉的差別在此是一個極重要的族群適應差異現象的區別條件，而一個城市或地區內，華人同質性族群集中或分散的人口分布現象，則是另外一個影響族群現象表現的重要變數。雖然由於印尼官方並未有具體的族群人口統計資料可以引用，然峇里島上的華人族群的人口數，根據過去研究者的推測，大約和全國華人人口占印尼全國人口中的百分之三比例相符。

然而上述雅加達等各地屬於華人口數比例高且較集中之地區，因此以上述城市如雅加達或棉蘭等地方的總人口數與華人口數相比，至少在其居住地華人並不能完全算是少數的族群的情況。例如，山口洋（Singkawang）不但是華人口集中的城市，還是客家族群作為多數的城市，在此地客家話流通的程度，與客家宗祠和會館的力量都是印尼國家範圍內相當獨特的現象。而當地的少數族群如達雅克（Dayak）地方文化與華人文化之間的互相融匯，也呈現在如華人與當地原住民都共同參與的元宵節Cap Ngo Meh遊行中，例如Chan在2009年的文章中，針對此一在地化的元宵節現象的研究，一方面具體呈現出西加里曼丹的客家族群和當地原住民如達雅克族的關係，另一方面Cap Ngo Meh的遊行也得以在當地推展多元文化和觀光城市特色化之下，成為一個印尼城市的代表性節慶，以吸引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觀光客（Chan 2009）。

而峇里島上的華人與當地峇里人的關係也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首先是早期移民大多是男性隻身來到峇里島，此點與其他印尼甚至東南亞的華人移民脈絡接近，早期移民與中國原鄉維持較密切的關係，因此娶親和第二代就學都仍有相當比例回到中國。然而在1950-1960年代之後，印尼與中國兩岸的政治變動與時局的混亂，開始了完全改變甚或切斷了華人與原鄉之間的關係。有關華人認同的議題，在蘇哈托執政的期間是不被碰觸的問題，直到1998年後政治開放與多元文化政策之下，才重新開放了華人社團的成立，而華人認同也才得以開始重新著地。

在臺灣，有關東南亞華人社群與東南亞客家族群研究的研究成果有相當的累積，其中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與臺灣東南亞學會舉辦多次的專題研討會及研究出版為主要核心。例如蕭新煌近期出版的〈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2011）一文中，對其過去所主持與參與的東南亞客家研

究提出綜合性的幾個研究焦點的成果整理，包括由會館、產業、聚落、宗教信仰與家庭等五大項研究主題切入社會適應與文化認同的變化。該文並提出客家作為一個亞（族）群與東南亞的「弱勢族群」，在面對如在馬來西亞國家中，強勢的馬來族群，或新加坡的多元的華人族群的社會環境下，在族群間互動接觸時，各自所產生的適應和變遷，這現象也同時反應在一些重要制度的層面上。

而以與本研究探討的峇里島客家社團的組織相關的會館部分為例，客家人與會館之間的關係，隨著其所在的社會與歷史時期而產生許多因應的變化。在同一位作者在2005年與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及張翰璧合著的〈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一文中，即針對會館在馬來西亞、泰國、汶萊與越南四個國家的發展歷史作出比較視野的探討，綜合會館的功能，有不同國家與歷史環境的差異，然而對於經濟生存、互相合作、發展工商與獎勵教育等，仍然具有共同的重要性（蕭新煌等2005）。然而，在不同的國家條件與國族建構背景下，作為「客家」或是尋求更大群體的「華人」認同，並逐漸轉向成為落居國的公民團體，是東南亞客家族群面臨生存挑戰的一種選擇。例如在蕭新煌2011年的文章中亦提出，在馬來西亞，19世紀初的會館是族群內的社區服務中心，而在馬國獨立之前，客家人與其他華人一樣都是以當時的「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會館更是出錢出力的支持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北伐和抗日，然而隨著客居國家亦邁入建國的時期，當地客家人的認同亦由「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而鼓勵同鄉申請成為該國公民，並轉變為當地民間的壓力團體（蕭新煌2011：3）。而該文亦指出，應當比較在表面上看來相似的各地方的會館組織，不同地方的會館事實上反映出地方的社會發展、族群結構和會館的領導層之基本差異。

而利亮時在其文章〈錫、礦家與會館：以檳城嘉應會館和雪蘭莪嘉應會館為例〉中，則具體指出在英屬東印度公司下的海峽殖民地，包括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三個馬來半島不同時期的重要港口地區，與福建人的商業經驗、資本與商業網絡構成的有利條件相較，沒有資本的客家人在此環境下是居於劣勢的，但客家人多半是以小資本經營如中藥店、當舖、打鐵店等生意，而馬來西亞西海岸的錫礦開採亦造就了客家人的錫業家的崛起，如雪蘭莪嘉應會館與霹靂嘉應會館的創辦人姚德勝等。而此一雄厚的資本與以經商的方式來經營會館，使得其得以辦理獎學金、資助華教、舉辦文化活動等持續吸引眾多會員。而檳城的會館則在福建人擁有廣大工商業勢力的背景下，當地嘉應州人多為從事小本經營或在教育及公部門服務，缺少資源且經營較困難（利亮時2011：11-12）。

張翰璧與張維安（2005）即提出在東南亞區域的客家人的認同，同時受到在地的民族主義與華人作為一體的華人性（Chineseness）的擠壓，因此在公共領域裡，客家的語言與文化認同無法彰顯，且受到所謂雙重隱形的壓力抑制。而林開忠（2011）的研究亦朝向隱形的客家認同與文化表現的面向，提出日常生活中的客家的概念，來研究東馬沙巴丹南與砂撈越石山的客家家庭，從使用客家話、飲食料理、祭祀祖先、信

仰與婚喪禮俗等面向來檢視認同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在上述提及的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中，有關會館與客家人產業的相關探討，以及有關族群與文化適應的城鄉差異之變項，在印尼的客家族群適應中將如何應用，值得再進一步的資料收集整理後再進行檢視。同時，由於印尼的國族構成，與各個島嶼社會的族群組成及族群互動歷史的脈絡均相當複雜，在探討客家族群的特殊現象中，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和挑戰。而繼林開忠、李美賢（2006）文中提出的東南亞客家認同層次上的差異之後，林開忠（2011）所提出的由私領域的客家脈絡來探討客家族群的研究路徑，或許能在東南亞如馬來西亞和印尼兩個國家，主流族群文化占有強大優勢的文化和同化政策之下，提出具有從人類學角度，由日常生活的觀察中討論文化認同與族群間關係的意義。

二、印尼國族形塑過程下的華人族群現象

新加坡的政治學者廖建裕（1993，2007）與澳洲學者C. Coppel（2002）兩人的研究已為印尼華人研究提供深厚且具不同歷史發展探討的背景，而臺灣東南亞客家研究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和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策劃與獎助的專題研究計畫下，亦在近十年內增加許多具體研究成果，本研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特殊社會環境下之民族誌事實研究，亦將能更充分地論述，印尼國族主義對於身為印尼華人之客家人融入印尼當地社會所面對的挑戰，以及客家方言群如何適應其作為國家文化中的少數族群的身分認同。

正如前面提到廖建裕等學者，對於華人社會內部的歧異性的強調，峇里島此地的華人社群不只有其獨特的島嶼適應，其內部還有不同來源、方言群、宗教信仰的歧異性在。很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對於印尼的華人社會研究，大多只針對以華人聚集較為集中的雅加達、三寶壟、泗水、棉蘭、山口洋與坤甸等地，位於峇里島上的華人社會則僅有相當少的紀錄，而印尼華人研究者對此地華人社會的研究亦往往侷限在某一範圍內，例如研究印尼華人歷史與信仰相當重要的法國學者Claudine Salmon和與其長期合作的印華作家Myra Sidharta，即有針對峇里島海南社群與其主要信仰宗教的文章發表。至於專門以峇里島客家族群為研究主體的論文則更是不曾有過。

峇里島的華人由閩南、廣東、客家、海南等主要方言群組成，部分自稱為「僑生」者，其祖先多在兩代以前，亦即父祖輩之前已來到峇里島上。「僑生」這個名詞乍聽之下會以為是否報導人是不是在臺灣或中國讀過書？但事實上，「僑生」在峇里島華人的華文語彙中指的是「在僑居地出生」之意。²

2 在著名的印尼華人學者廖建裕的研究中亦曾提出此一名詞的意涵，因此此一名詞在整體印尼華人的語彙中應是相同的(2007:10)。

由於印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國家經歷殖民統治與政治經濟上急遽變化的動盪不安，而其國家二十世紀中期獨立建國後，兩任強人政治領袖所主導的國族意識的發展對華人身為「外來者」、「他者」的移民或僑民身分有諸多限制，華人移民選擇來到峇里島定居，在荷蘭殖民時期的「紅溪事件」、二十世紀印尼共產黨牽連華族時期與1998年「排華事件」等三個時期有特別明顯的增加趨勢。在以印度教為信仰的峇里島上，華人在此似乎較其它印尼諸多的原住民社會中更能找到一個「他者」得以容身之地，而峇里島王國中即曾經有華人融入其皇室，與皇族曾倚重華人進行區域內貿易活動的歷史。然宗教上面的包容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共同記憶，是否就為峇里島的華人帶來一片光明美麗的移民樂土？可能並不全然，因為在印尼以原住民為主的國族主義思維下仍然潛伏困境，³ 雖然在觀察華人家族信仰與家屋空間的安置上，以及葬禮的組織和祭祀的安排中，我們不斷看到其納入部分峇里島在地的印度教的習俗，然而在此處，族群與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在地化的現象隱含有兩個層面的矛盾，一方面此一在地化代表華人族群對於印尼居住地文化環境的適應與融入，但另一方面，在地化相對於華人性（Chineseness）的展現，是否也產生了反其道而行的發展？這個可能潛藏的「矛盾」，在1998年後的開放政策進行與文化政策採多元文化主義的鼓勵下，是否出現了新的族群認同發展的空間？這些都是相當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印尼客家的研究並非東南亞華人研究中的顯學，除了由政治學者或歷史學者所進行的研究之外（李學民、黃昆章2005，李美賢2005，孫采薇2004），過去對於東南亞華人的研究以馬來西亞華人為主，一方面也因為馬來西亞的種族隔離政策，同時也造就了馬國華人圈使用華語和華人族群文化的延續，也使得相對來講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中的位置之能見性更高。印尼國家的國族政策則是另一種反向的發展，自從印尼現代國家政權建立以來，其國家面對轄下多島嶼與多種族群組成的社會文化，在政策上推行不同文化與族群者接受認同一統的印尼國家文化，包括在國家土地、國籍法、教育與語言政策上均為如此，也因此，身為華人族群的客家人便必須選擇，認同國家與同時放棄移民自身的原生文化的根基，但這也使得印尼的華人社會面對到文化、語言與社群成員凝聚的延續問題。

而對印尼華人研究甚多的澳洲學者C. Coppel認為，針對印尼自建國時期至開放時期的華人政策，可以與其國家的公民政策的轉變來觀察之，而此又可見到，一個國家對待移民的態度或政策的擬定，與一個國家理解此一移民成員如何作為構成該國家之共同體的身分的認定，以及與此身分認定相關的文化論述和社會價值緊緊相扣。這些對於印尼華人所處之政治環境的問題，亦相當影響了印尼華人所選擇的族群認同與族群記憶（Coppel 2002）。

近期的研究在雲昌耀（Chang-Yau Hoon）所著之《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

3 有關印尼民族概念的不同層次與政治人物的關係可參考廖建裕（2006：170）。

攻略與媒體》(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2012 (2008)) 一書中，擘畫出1998年以來後蘇哈托時期華人認同所面對的矛盾性格，在較開放與尊重多元文化的政策下，一方面允許了華人表明自己族群身分的社會環境，然而自60年代開始的禁用華語與關閉華校政策，卻使得新一代華人失去語言文化傳承的根源，轉而更加強化了來自融合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學校教育的印尼國家認同。雲昌耀的研究固然充分呈現出以雅加達為中心的華人認同現象，但華人在與印尼多島嶼與多元的文化接觸之下，其實已塑造出相當具差異性的島嶼文化風貌，在峇里島的華人社群即是如此。經由華人移民各島的不同原因、背景與歷史經驗，或許可以讓我們發現，更多樣化的華人適應印尼在地文化的過程與文化接觸融合的樣貌。

在峇里島華人整體的現象中，華人一直是被印尼國族標示移民族群的一個區隔的對象，但是其內在自我如何認同與如何呈現認同？這也是本研究之初步界定的主題，客家社群在印尼這個千島之國中的「他者」的環境模塑之下，如何展現其族群性。印尼國家在地理上為分散於海洋之中的島嶼的特性，在形塑其文化與社會形態、國家認同與區域發展上都有著決定性的因素，而峇里島上又是以印度教為主的宗教信仰，相較於爪哇的多數族群則是信奉伊斯蘭信仰的情況，客家社群如何自處於這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環境之中？這將會是本研究想探討的問題。

客家方言群的認同是如何在印尼峇里島的社會環境下被行動者具體化形構的？是否透過其所居住的空間與所參與的宗教或非宗教性活動？或是透過其他如婚喪儀式、服飾、飲食或其他的標示記號來完成的？亦即身為華人族群中的一份子的客家方言群，如何透過「自我畫界」來為其週遭所屬環境定位，並自我界定其在印尼，甚至是峇里島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中的位置。而相較於己身，對於如印尼人，峇里人、爪哇人或其他華人這些「他者」，峇里客家又是如何自我區隔與劃界？這些與其特殊的移民經驗和其所經歷或傳承的家族歷史記憶是否相關？家庭與學校教育在此扮演何種角色？教育在印尼與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中均扮演形塑其認同的重要角色，但兩者的國家教育政策正好是完全相反，前者是完全國家化，私人教育在1998年政治開放後才被允許，而馬來西亞的華教則一直能夠延續傳承華語，對於族群語言文化的傳承未如印尼的情況一般有嚴重的斷層。在此提出的社會界線所指的不只是一種抽象的觀念，也是一種透過制度和行動執行人群的分類與區隔，而社會資源更可能沿此界線被不均地分配。印尼客家人在此亦有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們各自又如何看待其所面對的制度分類？

三、印尼峇里島的華人族群現象

(一) 峇里島華人群像

過去有關峇里島的華人社會的研究相當少，相較於大量研究峇里島的英、荷、

法文等外文人類學研究成果，在搜尋資料後的整理時，確認過去除了零星的幾篇文章外，此一問題幾乎無人進行過專題研究。在印尼華人的研究中，峇里島的華人社群與印尼其他華人社群有相當大的差異性。華人在峇里島當地歷史發展與經濟活動上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早在王朝時期，華人即由該島東方的Padang Bai與北方Buleleng的Singaraja港口進入，從事海洋貿易與成為協助王朝統治者，筆者於2012年造訪時，發現即使Padang Bai現今只是一個國內航點的小港口，現在仍有華人社群居住在港口周圍。而Singaraja則是一直維持著有廟宇組織的華人社會。荷蘭殖民時期施行的種族隔離政策，曾經在Singaraja的港口都市空間隔離出華人居住區域，然而經過之後的都市發展，此一區域已經不再只限於華人居住了。

本人在與當地印尼學者溝通及文獻整理後亦發現，當地學者對於華人社群與中華文化進入峇里島所帶來的影響之問題相當關注，但卻往往侷限於田野語言溝通與文獻處理需具備中文、方言與華人文化之基礎理解的限制。在對照先前文獻整理的初步結果後，我們更可以確認這個族群是被大部分研究者所忽略的，但這個忽略背後或許還有印尼國家政策、國族認同與族群互動上面的原因在。本人在此篇文章中，將先針對以客家族群為核心，來探討其與中國原生文化和峇里島文化及島上不同族群間互動的研究問題上。

在兩位重量級的人類學者Clifford Geertz (1980) 與Fredrik Barth (1993) 的著作中，均有提及早期峇里島的華人移民在該島的活動。Geertz 在《Negara :十九世紀的峇里劇場國家》一書中，即提到19世紀後期貿易由王國根據貿易領土(kebandaran) 出租給七個中國商業貴族(subandar)，他們被賦予這些區域內的壟斷特權，出口米、咖啡、菸草、黃豆、牲畜(主要是牛)與進口鴉片(高達87%)與棉織品。華人在十九世紀後期活動的幾個主要地點包括有島上的東部Karangasem有一百個華人，主要從事進口鴉片與出口咖啡、糖、靛藍與木棉，而島上中部偏西的Tabanan的華人口，則已經有近4000多人，其中不乏已經實際擁有私人咖啡種植園者(Geertz 1980: 87-89)。這些早期以商旅身分進入該島的移民，與王國互動良好，因而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而晚期在1980年代因峇里島發展觀光，與因印尼1998年排華運動後而來自他島的華人移民，則多聚居在島上南部首府Denpasar，在社會適應與認同上有另外的考量。在這些來源不同的華人族群間，其身分與認同上也更趨於多樣性。現在島上的華人社群有來自不同原鄉的閩南與客家族群，亦有來自中國海南島與臺灣的閩南族群，而來自臺灣的漁業與中產階級經商社群亦有增加的趨勢。

在東南亞屬於早期華人移民的重要城市，似乎比較明顯仍可以看到以職業別來區分方言群的現象，例如在馬來西亞或泰國的情形(蕭新煌等 2005; 張翰璧 2011)。在峇里島，以目前調查的情況來看，則恰恰形成兩個不同時期的方言群與職業別的相關性現象，早期在1950-1960年代之前，從方言群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職業別的現象的確可見，然而對於較晚如1970年代後期開始，由印尼其他島嶼移入的華人族群，或由

臺灣移入的臺僑，其職業別則因著峇里島當地觀光業、商業和漁業的發展而有著不一樣的群像。

首先，從早期Denpasar首府商業核心地區的華人區的發展情況來看，在大約1930年代，卡加馬達路⁴ (Jl. Gajah Mada) 上大多都是由客家人與廣東人所開的店舖在做生意。而卡加馬達路以現在的蘇拉威西路 (Jl. Sulawesi) 和卡爾提尼路 (Jl. Kartini) 為界，以東稱為Dangin Tukad，其字義即為「河東」之意，此處主要由廣東人所開的店舖，他們大多是從事木頭生意或作木工，而卡加馬達路西邊則稱為Dauh Tukad，即「河西」之意，這一帶是屬於客家人作生意的街區，多為販賣日常用品與雜貨的店家。鄰接此路的巴東市場 (Pasar Badung) 附近還聚集著集中經營其他生意的人群，如南北向的蘇拉威西路上多為從事布匹買賣的阿拉伯人，而卡爾提尼路上，則是福建人的區域，他們大多作土產生意，販賣如黃豆、綠豆等農產品。也因為有上述的街區歷史發展的背景，因此卡加馬達路一帶被當地人稱作Pecinaan，即「華人區」的意思 (Pe-cina-an，印尼語的字根為 cina，即華人的意思，-an為地點之意)。蘇拉威西街區則被華人稱之作「阿拉區」，或印尼語的Kampung Arab。阿拉伯人和華人大約同時來到峇里島的首府Denpasar，上述的「華人區」與「阿拉區」是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點一起形成的。在蘇拉威西街阿拉伯人商店這裡交易買賣的是布，在今天此條街上的布店商家仍有很高比例為阿拉伯人所經營的。

在1960年後期禁華校之前，曾經有一所華文學校蓋在卡爾提尼路上，當時各個不同方言群的學生不論是廣東人、客家人還是福建人都前來就讀，此地提供從幼稚園 (TK) 一直到國中 (SMP) 的以華語教學的教育階段，根據受訪者的回憶，在1960年代的時候，學校共約有300多位學生就讀。而華語高中的教育，受訪者多提到是在距離峇里島較近的泗水就讀，或是也有人到雅加達去就讀華文高中的。先前華校是蓋在附近的佛塔藍路 (Jl. Veteran) 上，但是因為國營的 Inna Bali Hotel 旅館的擴建，才被迫搬到卡爾提尼路上的。

依據出生於「華人區」的報導人推測，福建人應該是華人族群中最早來到Denpasar的，可能已經有十代之久了，客家人則比福建人晚來，相較之下客家人可能是六代前移住到Denpasar的。早期福建人來到峇里島從事農耕活動，不像客家人和廣東人移民，移入到峇里島就是以從事商業活動為主。依據報導人的推算，似乎在1868年前後，即確定有福建人在峇里島上從事農耕，初移入的福建人是在現在島上北方的金塔馬尼 (Kintamani) 高山農業地區務農的住民。而本人於調查期間前往該地區，也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首先，該地區留有以華文命名的幾個村落名稱，如 Pingan 與

4 受訪者大約可以回溯到1930年代的記憶，但在一本有關峇里島紀年的書上 (Hanna 2004 (1976) : 200-201)，有著1920年代的華人街區的照片，照片上的建築與今日相去不遠。或許可以推論，在1920年時，此街區的規模已然成型。

Songan，前者音譯為「平安」，後者接近「松安」之音，⁵ 在火山湖畔的巴度水神廟（Pura Ulun Danu Batur）中，受訪的祭司表示，附近有許多地名尾音為-an的，都是因華人曾經居住過而命名的。當地人亦清楚記憶曾有華人居住在該區，只是因為山區農耕生活不易，大多均已陸續移出。另外，調查期間，亦曾在Denpasar訪問到來自該區的華人報導人，根據其小時候的記憶，因為祖母常與峇里當地貴族階層交友，他幼年時經常到對方家中遊玩而習得峇里貴族語言，在日後使用該語言時，經常讓當地人以為他也是貴族出身的峇里人而不敢對他等閒視之。其家庭移出該地後即前往北部省城Singaraja附近村落居住，之後又移居到Denpasar定居。

我在進行田野調查期間，曾多次在卡加馬達路、蘇拉威西路和卡爾提尼路觀察與透過介紹拜訪華人商家，希望能在那裡多認識到一些峇里島當地華人區的特徵，然而仔細地來回走過兩條街道許多次，第一印象是幾乎看不到任何華語招牌或是早先華人開設的店鋪類型。在卡爾提尼路上好不容易看到一家糕餅店，玻璃櫥窗裡陳列著拜訪當時中秋節應景的月餅。這是一家廣東華人開設的混合西式與傳統糕點的店，店裡同時也販售印尼當地及華人口味甜點的糕餅店，我當時留意到的中秋月餅，是來自東爪哇重要的華人聚居地區泗水（Surabaya）的「金陵月餅」。而老闆的太太是閩南人，兩人平常溝通是用印尼語，店的名片上印的全是印尼文，並未印有華文的名片。老闆很熱心地與我交談，同時也告訴我他知道的一些華人在峇里島上的活動，我試著向他詢問是否有訂閱華文報紙，他從架上拿出「大紀元報」來。但是他說他沒辦法閱讀華文，因為1960年代禁止華文教育之後，他們在峇里島就沒有接受華教的機會了，他也只勉強的可以說上幾句，訂報純粹只是為了支持這個華文報紙而已。

另外一家從外觀可以辨識的華人開設的商店，是峇里島上赫赫有名的蝴蝶環球牌咖啡專賣店，在其咖啡店招牌上將華文與印尼文、英文與日文並列，是在此區唯一可以見到的華語招牌。然而該品牌網站上有關品牌歷史的介紹，卻連一個與華人老闆有關的訊息都未寫上，由此可見其列上華文的招牌其實是與英文、日文等國際語言的意義類似的，並非要標示其與華人背景相關的意義，反而是針對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峇里島觀光市場，其中包括許多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臺灣與中國的遊客。我在店內停留了幾次的觀察，前來購買咖啡粉的顧客大多還是峇里島人，在店裡飲用咖啡的顧客則大多是外國人。另外，該咖啡店也在近期於觀光客聚集的Kuta區，開設了相當大且裝潢現代的咖啡館。在峇里島目前經營咖啡品牌的華人不少，例如金兔牌咖啡與小綿羊咖啡等兩個品牌。峇里華人很早即在Tabanan與Kintamani地區經營頗有規模的咖啡園，雖然華商目前大多還是以收購咖啡烘培為主要經營方式的，但以現在和旅行社合作吸引外來觀光客的形態，咖啡又是外國觀光客來到峇里島的重要消費標的之

5 假如該字仍以印尼語或峇里語發音，則Pingan的發音將接近「平贛」，而非「平安」，同理Songan的發音則類似「松贛」，而非「松安」，但當地峇里人卻以接近華語的「平安」和「松安」的發音作為地名，相當有意思，也表示華人曾在此地居住的社會記憶。

一，能提供給原本即占峇里島觀光市場第四位的臺灣客，或在人數上已經逐漸後來居上的中國陸客團熟悉的華語服務，在未來市場的發展上，仍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我們在逐步接觸到不同背景的報導人後，也認識了解更多華人舊街區空間上的特徵。首先，在建築外觀或店招牌上的確看不到什麼顯著的華人文化特徵或華語標示。招牌的文字一律都是印尼文，報導人的解釋是客人並沒有特別是以華人為對象，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想見，在印尼長達四十年左右禁止於公開場合使用華語的背景，華文招牌當然也是不可能被鼓勵標示的。另外，在這個街區的大部分華人商店外觀則有兩個特徵，一個是因為祖先祭祀的牌位仍設立在此，屋內又設立有神明廳，因此在頂樓牆面可以見到天公爐插香的香座，另一個則是，華人店家普遍設有八卦鏡作為避邪之用的設計。不過，亦有相當多的華人店家同時設置有天公爐與入門處的印度教神座，這種複合式的宗教信仰現象在峇里島華人街區或家庭空間中相當常見。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因為許多華人家庭中即有峇里人的血緣，且極大多數都是來自母方的血統，另一個原因則是，以尊敬在地神祇的心情，來奉祀當地的土地神的緣故。這也顯示出，華人信仰的儒、釋、道教與峇里島的印度教同時都有容納外來宗教信仰的神祇，與為其接納的外來神祇，安置一個雙方宗教信仰都可以接受的新的階序關係的特徵，而這樣的特徵，對於華人在當地的適應和融入該地社會的網絡，塑造出相當不同於印尼其他島嶼，尤其是像以穆斯林信徒為多數族群的爪哇或蘇門答臘等地的背景。

另一個華人商店建築的特徵是在我有機會受邀進入後才發覺的，雖然從外觀上看來的店面寬度並不大，但是入內後才知道其建築物內部相當長，此種建築一方面頗似中國南方漢人商店建築，另一方面裡面建築的空間內彎彎曲曲的走道，構造相當複雜，門也非常多，倘若不是該家的住戶，可能很快就迷失方向走不出來了。這樣的建築應該具有防禦的功能考量在其中，由此亦可見，華人在當地過去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相當艱困的適應與生存之道。

以上所描述的舊華人區裡，目前有不少店面已經不再開店了，但是根據報導人的描述，老一輩的六、七十歲世代的華人其實很習慣也很喜歡住在這裡，即使年輕一輩早就已經在他區置產或是經營生意了。原因除了習慣之外，還有此地點具有的便利性，因為市場就在旁邊，日常生活機能很方便，另外，受訪者提到，留居當地也有對於老家給予在地發展和生根的情感在其中。

居住在峇里島的華人彼此亦在某種程度上會相互區分，較早進入峇里島定居的華人與較晚從蘇島、⁶ 爪哇等印尼其他島嶼或從臺灣移入的華人。在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初期之後，峇里島當地觀光業和漁業的發展吸引了不少來自印尼其他島嶼，尤其是像蘇門答臘的棉蘭與廖島，或是鄰近峇里島的泗水、東爪哇鄉間等地的華人來到

6 當地華語習慣稱呼蘇門答臘的用詞。

此地。這些華人初到此地時，大多也是從頭開始經營新的生意，而因觀光業而發展起來的，除了有餐廳、旅行社、飯店、超級市場、各種民生需求用品等等通通都包含其中，因此各行各業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在其中辛勤的奮鬥。在當地峇里人的眼中，華人就是很善於經商，如同印尼其他地方的人對華人的看法一般。

四、印尼「峇厘客家鄉親會」：歷史、組織與成員

(一) 峇里島客家社團組織的成立歷史

峇里客家人的原鄉目前已知的有廣東的梅縣、大埔、惠州、福建永定等，但在「鄉親會」的組織裡並不會再依原鄉的不同而作區分，亦即客家成為來自不同原鄉客家人的共同認同。許多客家人在1930年代之前即來到峇里島，大約1941年之後，就沒有再直接從中國過來的客家人了。在現在「鄉親會」的會員裡，年紀最大的一位87歲的長輩，而從中國來峇里島最久的一個客家家族，可能已有六代了，大約為130多年前來的。

根據2010年發行的《印尼客屬聯誼總會成立兩週年紀念特刊》上，⁷ 刊載著由各分會各自整理提供的會史，峇里島的客家人在1920年代時就成立有「同志社」及「光華學校」這兩個組織，前者類似同鄉會的組織，後者為華文學校，但在1930年代在Denpasar的「峇塘中華學校」成立後便與之合併，就不再有此單一方言群組織而成的學校了。客屬同鄉在二次戰後的1950年代又成立了「新民會」的組織，直到1965年才遭封閉（2010：104-105）。

1998年蘇哈托下臺，印尼進行改革開放，在那個時候雅加達又開始重新組織了「客屬總公會」。1999年12月4日，雅加達「客屬總公會」創會會長吳能斌來到峇里島催生峇里客屬同鄉組織，⁸ 1999年，印尼「客屬總公會峇厘分會」成立了，但在2000年因為「總公會」的主席參與了政黨，那時候內部有一點不一樣的看法，在2001年5月12日經全體會員大會決議解散峇里的「客屬分會」，脫離雅加達印尼「客屬總公會」自立，改稱為「峇厘客家鄉親會」，⁹ 即現在該社團使用的名稱。目前的「鄉親會」，設有一位主席、兩位執行主席、四位副主席，共七位幹部。其中四位副主席分別負責財務、外交、社會福利、教育等工作。「鄉親會」中登記的會員有三百多人，主席是由會員所選出，其他職務則由主席安排，顧問的職務由一些年長者來擔任。

7 以下簡稱為《特刊》。

8 以下簡稱為「總公會」。

9 以下簡稱為「鄉親會」。

（二）「峇厘客家鄉親會」的活動紀錄

由上述該《特刊》上所紀錄的，同時也根據報導人的補充說明，峇里島的客家組織自1999年即開始參與第一屆的印尼客屬懇親大會，當年的會議於12月10日在雅加達舉辦。2000年在Sanur信心旅行社設立了臨時會所，而當年的11月16-18日，在參與完同樣舉辦於雅加達的第二屆印尼客屬懇親大會之後，便前往中國閩西的龍岩參加了第十六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2010：104），開始了與更廣大客屬網絡的聯繫，近幾年也都固定組團參加世界客屬總會的活動，這些會議同時也成為鄉親重新回到原鄉探訪，和進行團體觀光活動的機會。「鄉親會」也派代表參加雅加達總會或其他印尼各地客屬社團的活動，如2012年才剛參加完蘇門答臘的Bengkulu與位於廖島的Tanjung Pinang新成立客屬社團的慶祝會。在每次的印尼客屬懇親大會上，都會擬定主要討論的議題，除了會務的推動與報告上，每年依主辦單位設定下，還有包含更廣泛的如何提高印尼經濟的水平，或是有關華語教育的推動等等議題的討論。而最近的重點會務之一，則是在印尼的縮影公園（Taman Mini）中的印華文化公園已經動土興建以客家土樓為建築形式的客家博物館，¹⁰ 動土儀式邀請了印尼客屬社團的各地代表來共同參與。

關於社團進行的工作內容部分，在2001年仍屬分會的階段開始，「鄉親會」即開辦了華語補習班，至今仍延續此一華語教育的傳習工作。在2004年還曾兩次舉辦華語師資班培訓，由臺灣來的老師進行教授（ibid：104）。受訪者也提到，開辦補習班是為了能夠讓下一代接觸到華語，現在社會上也有學習華語的風氣。至於被問到為何不是客語的補習班呢？原因是，現在已不太有使用客語的機會，但是受訪者也表示，假如能有機會讓年輕人能夠接觸並學習到一點客語或客家歌謠，也是具有文化傳承的意義的。目前在參與客屬聯誼會的大會上使用的也都是華語，因為客家話也有各種不同的方言，因此還是華語比較通用。關於教育的工作上，「鄉親會」也積極安排或參與協助峇里島教育單位，與中國或新加坡等地進行的學生交流等事宜。

「鄉親會」每年至少辦一次全體會員活動，也集體參加由37個峇里島華人社團聯

10 訪問過程中報導人提及了該會亦受邀參加動土儀式。筆者查詢中評社網路新聞上的紀錄，印尼縮影公園是由前總統蘇哈托夫人基金會1975年在雅加達倡建的，主要用來展示印度尼西亞30多個省的民族與多元文化。1998年客籍的熊德怡將軍，經過與蘇哈托將軍的溝通，獲劃撥一塊45000平方米的園內土地，興建印度尼西亞華人文化公園。園內建有中華牌樓、唐人街、西遊記的雕塑，以及花園、水池、拱橋和涼亭，為展示傳揚華人文化提供了一個窗口。熊德怡為了讓下一代繼承華人文化，也讓其他族群更能了解華人的歷史文化，因此籌劃建立一個紀錄印尼華人艱苦開拓創業歷史的博物館。在得到印尼客屬聯誼總會支持下，近期已開始啟動興建一座土樓式建築的客家博物館。博物館預計將於2014年落成，第一層設計為會議廳、客家美食小館等多功能區，第二、三層則為展覽廳，用於展示紀錄客家人「過番」的文獻、圖書、照片、通行證，以及生產、生活相關舊實物等客家華僑華人的歷史文物（中評社2012）。另外，根據印尼星洲日報報導，印尼民主民族論壇總主席李伯巧，在提出希望有更多華人團體為這個公園的建設作出更多貢獻時，提及這些年來，印尼華人文化公園的建設，大部分是由個人或同鄉會、宗親會所興建（印尼星洲日報2011）。

合舉行的春節團拜活動，參加的單位包括總會設立在雅加達的百家姓協會、中華總商會、印尼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合作協會，或是島上自行成立的「峇厘客家鄉親會」、「海南大家族會」(Perkumpulan Keluarga Besar Hai Nan)、¹¹ 峇厘省華文教育統籌機構、印尼東區文友協會、峇華中小學、曾姓宗親會、蔡姓宗親會、陳府真人廟(Kuta)、昭福廟、關公廟、Co Po Kong Bio、¹² Vihara Dharma Cattrra (Tabanan) 等等，目前參加的社團以位於島上南部為主，參加成員從涵蓋以全體華人為範圍的1999年之後成立的泛華人社團，到當地學校等文教機構，還有廟宇和宗親會組織，然而我們也留意到，「峇厘客家鄉親會」與「海南大家族會」為其中唯二在社團名稱標示族裔的團體，而昭福廟為在2010年前後，以海南人為主要發起人而建立的廟宇。

「鄉親會」平日以兩個月一次的聚餐為活動，但只要想來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不限定只有客家人才可以參加。主辦人表示，因為這裡客家人數並不算多，也因為有很多人其實也是只有一部分的客家血統，所以開放讓更多人參加也比較熱鬧，根據訪問與實際參與聚餐的場合，參加者大約有200人左右，在餐廳裡聚餐坐了有二十個圓桌，有來自峇里島的南部各地Denpasar、Tabanan、Klungkung等地的客家鄉親的踴躍參加。參加者大多屬中年以上，年紀最大的有一位87歲的耆老。「鄉親會」聚會時，向每個人收取的費用，一部分是聚餐的開銷，剩下的部分則會轉給主辦餐會的婦女部運用。

「鄉親會」目前已有一棟洋房作為會所，座落在Denpasar北邊幽靜的住宅區內。會所一樓有交誼空間與桌球檯，牆上與櫃子上掛了許多與各印尼或中國客家社團互訪或拜訪的錦旗與紀念盃。會所裡有一整面牆的華文書，有各式各樣的書籍，希望能提供有興趣者借閱。而二樓的部分則作為華語文補習班的上課地點，我到訪的時候正好有一位國小年紀的學生由母親陪同前來上課，小朋友上的也是三語學校，但是家長覺得學習華語的時間不夠，因此替他安排來這裡上課。根據前述《特刊》的記載，會所的購置來自會員參與的互助銀會，自2002年3月起，會員每月繳交會銀，採無利息方式，「鄉親會」將會銀存入銀行生利息，這些利息就當作「鄉親會」日常開支之用，而銀會期滿後，本金全數歸還給銀會會員(2010:105)。利息所得相當可觀，因為除了上述的日常開支之外，還能購置這棟會所，也足見參與銀會者之踴躍與團結之心。

而「鄉親會」除了參加會內與印尼國內客屬聯誼會的相關活動之外，對於峇里當地社會也有許多主動提供的社會服務工作，例如下鄉進行醫療服務與定期的捐血活動的舉辦，其中一位受訪者告訴我，他跟著社團下鄉的醫療服務到過島上許多非常偏遠

11 依照印尼名稱之意譯。

12 由於仍限於書面資料上的參考，此處所指的總舖公廟（或拼寫為Cong Poo Kong Bio）是何處仍尚待確認。根據文獻與初步訪查，島上目前至少有4-5處總舖公廟。

的地方。上述的《特刊》上也紀錄著，在當地發生重大事件時，例如2002年峇里島的北部Teja Kula縣發生土崩，「鄉親會」成員即有20多人前往災區賑濟，除了現金之外，還帶去災區急需的救濟物品和重建的物資 (ibid : 104)。

(三)「峇厘客家鄉親會」的分會成立過程

「峇厘客家鄉親會」在成立後，即在島上一共設立有三個分會，分別位於Denpasar，東部的Klungkung 與西部的 Tabanan。但島上各城市若以客家人口多少來排序則為Denpasar，Singaraja，Tabanan及Klungkung 四個城市。另外，位於峇里島東側的龍目島 (Lombok) 上也有很多客家人居住，也成立有一個「客屬會館」。龍目島上的訊息是來自一位「峇厘客家鄉親會」成員，出生在龍目島，目前已經快七十歲。龍目島由於鄰近峇里島，此地的就業機會與經商機會大過於龍目島，因此島上有不少由龍目前來工作或移住的居民。而根據前述的《特刊》，龍目島的客屬會館成立於1933年，在成立之後兩年，便建立了會所。而且該客屬會館即使在蘇哈托統治的32年裡，全印尼的華人社團都被關閉之時，該會館的會務仍然能夠持續進行，這或許有當地一些特殊的社會因素或政治脈絡值得再探討。而1994年舊會所因馬打蘭 (Mataram) 市政府¹³拓寬馬路而拆掉，另覓地址所建，然其設備相當齊全，除了有宴會廳會議室儲藏室之外，館外甚至還設有一個籃球場與小型的殯儀館。而現今之會館乃因馬路再拓寬，與其鄰接的印尼國營石油公司擴建，而再次搬遷，然此新會館建築得以重新建立之際，主事者還特別前往馬來西亞參觀了數間有名的會館，回到龍目再因地制宜地設計出今日的會館建築。此會館大門前有一對石獅，同時其所設立的禮堂，還成為島上華族 (含客家、廣肇、潮州、福建人) 與土著舉行婚禮與祝壽喜宴的理想場所 (2010 : 83-84)。¹⁴這也可以看出，即使今日，會館除了作為婚喪禮俗的聚會聯繫，與社團人員的相互協助作用之外，在不同島嶼上的社會環境氛圍下，也具有擴大其與在地社會的聯繫網絡與參與當地社會脈動的作用。

Klungkung分會為峇里島第二個成立客家「鄉親會」組織的，在Denpasar 成立「鄉親會」五年之後成立。目前在Klungkung城內大約有160戶的華人家庭，而其中閩南人就占了100戶左右，其他族群則有客家人約15戶，廣東人也約15戶，海南人也大約15戶。根據該會會長的自述，他雖然只有母方一半的客家血統，但是因為看到客家人數少，想要幫忙，所以便加入了客家的「鄉親會」組織，而且自成立以來他已經擔任兩期的會長。另一個有客家「鄉親會」分會的城市Tabanan，則因為距離Denpasar很近，使得更多鄉親選擇移居到首府工作經商，因此Tabanan的客家鄉親成員大多已經不再住在當地了。

13 龍目島之首府。

14 龍目島上除了因殖民而東進的峇里島人之外，其原住民有相當多的Saksak族，以伊斯蘭信仰為主。

(四) 與印尼其他客家組織的比較

前文中已經提到，即使在峇里島客家人的原鄉有廣東的梅縣、大埔、惠州、福建永定等，但不論在組織上或是在「鄉親會」的組織裡，並不會再依原鄉的差異而作區分，此點與客家人在峇里島上人數分布較少有關，同時當然也與客家群體在地適應的歷史過程有關。因為在將前述的《印尼客屬聯誼總會成立兩週年紀念特刊》上所刊載的(2010: 58-106)，以當時登錄的30多個印尼客家社團的創立過程與名稱整理之後可以發現，只有在華人人數且客家人口較集中的雅加達、棉蘭、泗水等地，才出現有以原鄉標示社團名稱的現象，例如成立於雅加達的「印尼梅州會館」，或是設立於雅加達與棉蘭的「印尼大埔同鄉會」，還有前身為1978年建立的永定互助會的「雅加達永定會館」，以及成立於1949年的「印尼雅加達惠州會館」，該會館的前身為魯班廟，也是很具體呈現出客家人在當地的職業和同鄉情誼連結的一個實例。而印尼泗水的「惠潮嘉會館」，不只在名稱上具有特別歷史脈絡的意義，同時也是現今印尼客屬總公會社團網絡中，最早成立的客家會館。該會緣自於清朝咸豐6年建成的廣東公祠，後因移民泗水的華僑漸漸多了起來，先後脫離總組織另起爐灶，因此公祠內只留下粵東地區的惠州、潮州、嘉應州的華僑理事和會員，因而有了「惠潮嘉會館」的名稱，該會於2010年被推舉為東爪哇與印尼東區客屬會館的聯絡處。但從上述的客屬會館成立過程紀錄中我們也觀察到，在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的網絡中，並不見客家人群聚集居的山口洋(Sinkawang)與坤甸(Pontianak)兩地的組織，這或許也是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五) 北部舊省城Singaraja的客家族群紀錄

也有不少華人居住的島上北方最重要的峇里島舊港，也是荷蘭殖民時期的峇里島首府Singaraja，卻至今仍無客家「鄉親會」的分會成立。我在拜訪期間曾訪問過當地的一位客家報導人，他年輕時由泗水來到峇里島，仍然會說客語，受訪者在Singaraja的客家朋友大多不會說客家話了。他的太太擔任公職退休，是爪哇人，報導人曾經擔任過兩任的Singaraja西部一個村里(Banjar)的里長，由此可見其在地方的聲望與適應的良好。子女雖知道自己是華人後裔，但是只能說幾句非常簡單的華語，大兒子的妻子也是華人，同樣不會說華語。他們拿出家庭相本來與我分享，每逢春節與清明，目前散居在峇里島Denpasar與泗水等地的家族成員都會齊聚一堂，過節與掃墓。同時他們也有家人選擇在1960年代後期回到中國的歸僑農場，之後又移出到香港居住。每隔幾年，分散各地的家人也會相互拜訪，到香港或到泗水和峇里相聚。過去會再回到泗水的重要原因，是因有祖墳仍在泗水，但近期已經作完撿骨火化儀式後，將骨灰撒到海裡去，因此四月份進行掃墓祭祀時，只要朝向海洋祭拜即可，供品仍沿襲華人傳統有三牲，包括雞、豬、魚，還備有水果、茶與香。現在受訪者與兒子每日輪流早上與下午向家中客廳懸掛的聖母像以及祖父母的相片上香祭拜，在這裡我們看到混合了天主教儀式與祖先信仰祭祀的儀式內涵。

報導人的妻子是天主教徒，家人也隨著信奉天主教。Singaraja只有一座天主堂，訪談中得知，華人的天主教友似乎占了教會成員的一半，教會只有禮拜六、日有活動。受訪者家庭在華人的傳統節日中只過農曆春節，過年時會給晚輩包「紅包」。在教會慶祝新年時，有舞獅的表演，受訪人以印尼語稱之為Barong sai，今年則因為姻親過世，所以未過新年。

關於在北方的情形，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當地最主導的華人社團當屬以主要寺廟靈源宮和城隍廟為核心所組成的三教協會，和以喪事組織為重點的靈山亭，而未見以方言群或族群組成聯繫的社團活動。可見此地未有客家分會組織的原因之一，除了客家人在當地華人組成中人數較少之外，在當地早已有相當完整且能持續結合起地方社會運作的三教協會的情況之下，少見其他華人社團的活動。¹⁵此一現象相當不同於南方首府Denpasar，當地顯然屬於較晚形成且都市化現象顯著的華人社群居住地區。

另外，在相當難得的機緣下，由一位報導人提供了一份1934-1935年間編輯的Singaraja「峇厘陵中華學校」的建校25週年紀念特刊，該校與當時當地的中華商會共同成立於1908年，商會的會董與學校的校董同時擔任兩個組織內的職務運作工作。在該刊中所列出的歷任會董與校董名單及其籍貫的名錄中，自1913年的第六屆首度有一位祖籍為廣東嘉應的賢達朱坤進列名在議員的名單之中，他於1915年第八屆名單中已晉升為協理。該組織共設有1位總理，1位副總理，6位協理與16位議員。¹⁶在該刊中所列出的第一屆至第二十屆的會校董名單中，福建祖籍者占了絕大多數，歷屆總理一直由祖籍福建者擔任。然而自上述的第六屆開始，至少都會有一至兩位祖籍為廣東梅縣的客籍人士列名其中（「峇厘陵中華學校」1935：3-22）。由此可見，客家人在該城居住的人數雖然與福建人無法相當，然其在華人組織之中，仍然有其代表性的地位。

（六）由「鄉親會」成員的生命史看峇里客家族群的在地適應

以下針對幾位受訪的「鄉親會」成員對於過去個人與家族歷史的描述作一整理。¹⁷第一位受訪者陳叔1932年出生於首府Denpasar的Gaja Mada的河西地區，¹⁸祖先是來自廣東梅縣的縣城，他的妻子出生於泗水。陳叔表示家族的13代祖遷去中國廣東梅州（縣）的松口，一直在松口發展到第20代。來峇里島也已5代了，他本身是第3代，也有孫子了。他的祖父來到峇里島，賺了錢後寄回中國買田買地，老了以後「落葉歸

15 根據一位主要報導人的觀察，甚至連Denpasar可見的百家姓組織與印尼各地常有的華商會的組織，在Singaraja似乎都未有分會。

16 議員人數隨編制變動而有人數差異，例如隔年便縮減為12位議員。

17 以下第一位、第二位與第四位報導人訪談內容，由劉瑞超同學協助進行與整理。第三位訪談內容，部分來自黃郁倫同學的訪談與整理。感謝兩位的辛苦協助。

18 文中所有報導人之姓名均為假名。

根」，靠收租生活，回鄉養老。陳叔的祖父將兒子，也就是他的爸爸，留在峇里島接續工作，但卻帶著孫子回到中國，讓孫子在中國唸書。陳叔的祖父在來峇里島之前，曾先到非洲的模里西斯工作，當地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客家人，而印尼的邦加和勿里洞客家人非常多，因此連當地的原住民也會講客語。

陳叔於戰後的1948年曾回到老家梅縣的松口鎮，那時的Denpasar只不過是個比松口鎮更小的鎮而已。他在松口中學念了兩年書，他認為客家話與國語（華語）差不多，¹⁹ 音很接近，尤其梅縣一帶的音更相近，但「沿岸的（客語）較難聽」，不容易聽懂。他於1950年回到峇里島，之後前往泗水進入華校念了初三及高一，但因覺得泗水環境不好，決定換學校，所以又至雅加達的中華中學念了高二及高三，華校的教師都來自中國江浙一帶。在那個年代裡，華人學生都是念華校，一直到1965年華校被關閉以後，才開始進入印尼學校就學。陳叔高中畢業後原本打算回中國大陸，但因父親病重於是留了下來，接下父親的工作，經營雜貨店生意。他的父親在峇里島主要都住在Denpasar地區。陳叔表示客家人以做雜貨店生意的居多，以前客家人來到峇里島時都沒帶本錢，慢慢發達後，才租人的店做生意，但客家人不買地，因為要將錢寄回中國，而且買地的話稅很重，用租的比較便宜。

接下來陳叔提到對其他族群的觀察，在巴東市場的鄰區作生意的阿拉伯人也相當刻苦耐勞，他們經營的模式則是專門買地用來租人賺錢。廣東人則以做工藝、木匠的為主，就像「有分工」一樣，因為做雜貨的、作木匠的都會把自己親戚拉進行業裡。而島上的海南人則多半在海口聚居生活，就像在島上南邊的Benoa港口地區，海南人是自己帶船來，依海維生，那裡的昭應廟附近就有個海南人的墓園。但現在峇里島的規定是土葬後15年一定要起骨，除非墓地還有空位，可以付費再放。過去移至峇里島的福建人則多是靠山居住的居多，許多是已經很多代沒有回祖國了，²⁰ 因為福建沿海的治安不好，所以都不回去了。福建人大多住在鄉下，因此他們申請得到土地，用來當住家或店屋，不像客家人都是租地的比較多。

陳叔就讀小學的孫子現在念的是三語學校，他表示來峇里島的第四、五代都沒去過中國了。他覺得三語學校有個缺點，因為同時要學三種語言，但華語很難學，英語及本地話比較沒問題，如此導致學生的華語程度不佳。應該把三語學校改為雙語學校，只學華語跟印尼語就好，等到升五、六年級再來學英語，否則中文太難了，都是最先被放棄的。現在學校是靠拼音來學中文。陳叔的孩子這一代就沒念華校了，但似乎仍會說客語，他提到客家話是用「阿姆話」來稱呼的。客家人都是用三牲拜祖先，並且配上三碗飯。福建人拜祖先則多達十幾種菜，飯有12碗。福建人來到峇里島已經有6到10代了，尤其東爪哇那裡更多，客家比較晚來。談話中又提到「客家人吃比較

19 報導人為了來自臺灣的我們，特別以國語的慣稱來指稱華語。在此保留報導人當時的用語。

20 在此保留報導人使用的詞彙。

鹹」，提到建築時，受訪者說在老家的形容是，「客家都是圍屋」。客家祭拜的神有土地神、伯公、天公等等，佛堂裡會拜觀音，但家裡比較少拜觀音。

在上段訪問過程中，陳叔提及過年與祭祖的時候，會特別強調以三牲或節日對應的祭品來進行祖先祭祀。而另一位受訪的陳阿姨，平常因為宗教的因素吃素已經超過十幾年了，平時對於食物的要求是清淡簡單，除了宗教的因素之外，也有養生的訴求。孩子與孫子們會在週末回來與她一起吃飯，他們會安排到外面的餐廳聚餐，聚餐雖不只挑中式餐廳，但如果有新開張的中式餐廳，大多會去試試。在外吃飯時，她不會只去素食的餐館，如果有客人或朋友一起吃飯，她也會選擇以爪哇菜聞名的大型連鎖餐廳，但是只選點些素食可吃的菜色，就是吃桌邊素也可以接受。但阿姨家裡在一年的節日中特別重視春節過年，她提及在除夕的團圓飯，會準備整桌的客家年菜。大年初一，同輩的兄弟姐妹、孩子、孫子都會來家裡拜年，她也會到兄弟姐妹家去走走。她提到過年是很重要的，之前過年時，家族裡有人自中國買紅色肚兜回來給小孩子穿來拜年，感覺很有喜氣，也讓大人很歡喜。關於過年會吃的菜色，包括有海參、鮑魚、豬腳、釀豆腐、蒸魚或煎魚、蘋果、橘子、甘蔗、糖果和花生等等。她解釋豬腳是取客語豬爪之音，寓意是「招財進寶」；釀豆腐則象徵「榮華富貴」；甘蔗則依其一節一節的形狀是「步步高升」之意。過年一定要吃豬腳是討個吉利。至於在春節期間祭拜祖先的菜，會用三牲，即煮好的雞一隻、豬肉一塊、魚一尾，另外，還有水果和過年的糖果和花生糖。春節祭拜祖先的時間是在除夕夜的晚上，之後是全家圍爐的團圓飯。初一早上，則是會有家族成員回來拜天公，然後再拜祖先。她提到叔叔家裡有在拜灶君（灶頭下的神），但她自己家只有擺放照片的供桌來祭拜祖先。陳阿姨說可能因為母親是汕頭人，沒有拜灶君的習俗。至於她現在平日祭拜祖先，只有用清香及鐵觀音或是龍井茶等中國茶。拜完了，茶就當作自己日常的茶飲。

由於陳阿姨提到一年裡只有過年才特別會要廚娘煮這麼一次客家菜，我請教她原因是為什麼？她的回答是，只希望下一代的年輕人不要忘記自己是客家人，是從中國來的。她出生在Denpasar巴東市場旁最早形成的華人商業街區，小時候家裡經營雜貨店生意。阿姨和同輩的兄弟姐妹以及堂兄弟姐妹都習慣用客家話交談，而且他們都受過華文中學的教育，華語也相當流利。

陳阿姨平時即積極參與華人社團，經常往來於雅加達和在其他島嶼所舉辦的華社活動，對於客家的認同更是重視。她的先生是屬於她口中所說的「僑生」華人，即在峇里島當地出生的華人，她特別強調要維持這個家庭的傳統，於是希望透過春節過年的家族團圓，傳承來自家鄉的客家菜餚，而節日與祭祖的食物在此扮演的文化標記的意義更加受到突顯。

另一位Denpasar受訪的客家鄉親林叔，提到移入峇里島的原因，原先在中爪哇長大的他，一直到1998年發生了五月事件，他和家人為了人身安全，才商量要搬到峇里

島。²¹ 他解釋說，當時認為到這裡會比較適合是因為峇里人的宗教跟華人比較相像，經常上廟拜拜，又都拿香。那時候他先來探路，覺得在這裡可以做電器生意，然後就帶著家人一起來了。然而局勢穩定之後，他和家人又都分散各地，在印尼其他島嶼與新加坡各自工作。這種情形似乎對於某些移居峇里島的華人來說，相當普遍，亦即將峇里島當作是一個過渡的居所，而非定居的所在。

中國的政治與華僑政策的更迭，改變了印尼華僑回鄉的路徑。以林叔為例，在1950年代的時候，他的兄姊就已經回到中國去了，剩下一個家人在1960年代的時候回去。之後輪到他要搭船的時候，當時的中國卻剛好改變了對華僑的態度，說在外者就要自己在當地「生根發芽」。那時候載著華人回國的是「光華號」，「光華號」只從雅加達港口開船，當他一切都準備妥當，護照辦好了，衣服也都寄回家鄉了，但最後一艘船班開走之後，卻再也沒有回來接他了。「一切都是命」，報導人笑笑地述說著，但從那之後就沒辦法再當中國籍的華人了，變成必須入印尼籍。那現在可以移民回中國嗎？但對他來說，現在就算回去，如果沒辦法發展生意也不成，目前他在印尼的事業穩定，因此他覺得像現在這樣定期回去探親就足夠了，報導人每年均會回廣東三到四次。

另一位受訪者張爺已經80幾歲了，他的父親在中國出生，曾在外島開店做生意，²² 去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批貨，所生的四子四女都是在峇里島出生。張爺本人出生於峇里島，此地原來華語稱之為「麻厘」，後來才改叫「峇里」的，1932年回到「唐山」念了五年書。他在中國唸完書，直到日本戰敗後的1949年才回到峇里島。受訪者說，在「新中國成立」後直到1980年，他才第一次回到中國，當時還被當作匪諜調查。張爺的媳婦是臺灣人。關於客家「鄉親會」的聚會，張爺說不只是客家人，只要認同客家且願意參與的，無論福建、廣韶都可以來參加，另外，據他所知，福建鄉親則不像客家「鄉親會」有此類聚會。

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除了在節日飲食與祭祖習俗的部分，以及六十歲以上世代對於客家話的熟悉與認同感很明顯之外，即使是社團成員，對於客家性的展現似乎並不特別重視或突顯，反而強調只要認同客家與「鄉親會」的宗旨，其實很歡迎更多人，也包括非客家人來參與「鄉親會」的活動。雖然受訪者言談中仍有對於早期客家先賢即有興學投注在華文教育的驕傲，也針對早期家族適應峇里社會經濟環境所做的不同於其他族群的經營策略，或是對於客家原鄉仍有的一點點記憶，但其實對於甚麼是客家，或對於要傳承給下一代的文化，早已經很清楚地了解這在此地環境氛圍下的困難。然而，參與社團者認同應該積極經由當地客家社團出發，來連結外於本島的更廣大的客家網絡，例如參與印尼「客屬總公會」和「世界客屬總會」，或是參與客家

21 排華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即為中爪哇的梭羅城。

22 外島一詞，為印尼華人口語上指稱所有爪哇以外島嶼的意思。

社團者，同時也有部分參與在其他島上的華人社團組織，例如「百家姓」組織或華商會，這些或都顯示出，「客家」在峇里島的社會情境下，比較是被視為與更廣大的華人社群間的一種分支性關係的認同。亦即，其認同是展現在屬於華人的一種人群組織，而其分支特性讓其不論是在島內或是在印尼國內，甚至是在越來越頻繁的與中國或與世界華人網絡的聯繫之中，得以作為從屬且銜接於更廣大華人社群網絡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客家的社團組織在此代表的是，在一個相互交錯的華人網絡連結下，建立起的一個集體性公共事務參與的社會網絡。

上述現象或許可以視為峇里島上的客家族群，在多數為閩南方言群的華人社群組成中選擇的一種對應與適應。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這樣的現象，在峇里島上，華人族群已經是少數族裔了，再在其中組成一個更屬於少數族裔的封閉性團體，其實很難發揮任何作用。相對來講，雖然華人是峇里島上的少數族裔，同為閩南方言群者，卻似乎無感覺有必要組成一個以方言群為組織的社團，這一方面是因為其在當地華人社群中的重要性已無庸置疑，反倒是閩南方言群內部的差異性，例如不同宗教與不同宗族之間的差異，會在閩南人社團組成之中被表現出來。這或許可以作為理解何以在峇里島，屬於華人中較少數裔的客家族群與海南族群，會更清楚其作為不同於閩南人的「他者」群體單位，而傾向於組成個別族群團體，而作為華人的多數則沒有特別標示閩南方言群的族群團體的需求出現。此一族群中的相對多數與相對少數的問題，尚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在此也僅提出一個初步的觀察，未來尚待進一步的擴大與當地華人社群接觸的範圍和訪談，再作更細緻的確認與分析。

五、結論：「他者」之鄉中的印尼峇里島客家族群現象

本研究嘗試將印尼峇里島之客家社群，放在當地的華人社會整體現象中進行初步的探討，並透過人類學的生命史訪談與參與觀察方法，探索其在印尼國族主義建構過程中，所面臨的族群認同、文化延續與社群凝聚的問題。本研究以客家人作為印尼國族主義氛圍下，與面對峇里島以福建閩南人為主的華人社群中的「他者」之概念進行討論，並特別針對當地以客家鄉親為主要的入會對象的社團組織「峇厘客家鄉親會」，以及其所承載認同的文化符碼，從家族歷史、語言、信仰與飲食文化等現象，作了較集中的民族誌紀錄。以「鄉親會」作為凝聚客家同鄉與親緣之間的組織，不但在峇里島上37個華人社團組織網絡中，特別以方言群作為主要的聯繫的少數單位，也是客家鄉親在島上一個重要的情感交流，和讓下一代重新認識客家文化和華語文的重要中心。而假如我們與其他亦以標示族裔身分為組成的「海南大家族會」組織和以海南人為核心組成的廟宇昭福廟成立的現象並置時，也讓我們更希望能夠在未來深入



討論，何以在1966年禁止華人結社的近40年後的今天，族群可以重新成為社群團體共識與凝聚的原因。

今天的「峇厘客家鄉親會」組織，延續了在1920年代與1950年代曾經組織的「同志社」和「新民會」，成立初衷在於將客屬同鄉集合起來組成客家族群團體的想法，而在1999年之後，以「客家」為命名的這個社團組織，也重新成為結合共同社群意識與聯合團結其成員的方式，以適應於當今的印尼社會。而該社團自1999年起加入印尼「客屬總公會」的網絡後，也更進一步架構和持續與「世界客屬總會」的聯繫。

總體來看，印尼峇里島的客家族群，如同印尼其他地區的客家人在經歷過艱困的移民適應與政治風潮之下，選擇走出自己穩健的步伐。「峇厘客家鄉親會」能夠吸引近300位入會會員，同時與印尼各地和世界客屬組織之間建立聯繫網絡，會所亦設立華文圖書館，更以社團為基礎積極進行社會公益活動參與和開設課程作為華文教育的傳承中心。客家族群雖為峇里島上華人族群中的少數，也非最早來到峇里島的華人方言群，然而其在地生根發芽與茁壯的堅忍毅力相當難得。

參考文獻

-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2010）《印尼客屬聯誼總會成立兩週年紀念特刊》。雅加達：印尼客屬聯誼總會。
- 李美賢（2005）《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臺北：三民。
- 李學民、黃昆章（2005）《印尼華僑史：古代至1949年》。廣州：廣東高等教育。
- 利亮時（2011）〈錫、礦家與會館：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為例〉。見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65-85。
- 林開忠（2011）〈日常生活中的客家：東馬沙巴丹南與砂撈越石山的客家家庭〉。見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403-443。
- 林開忠、李美賢（2006）〈東南亞客家人的「認同」層次〉。《客家研究》1：211-238。
- 「峇厘陵中華學校」（1935）《峇華二十五周年紀念刊》。峇里島：「峇厘陵中華學校」出版。
- 孫采薇（2004）〈政策、制度與族群關係：印尼與馬來西亞對境內華人族群政策的比較研究〉。《亞太研究論壇》24：56-91。
- 莊英章、簡美玲（2010）〈導言〉。見莊英章、簡美玲合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莊英章、簡美玲主編。新竹市：交大出版社。頁xxi-xi。
- 雲昌耀（2012）《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攻略與媒體》（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育建譯）。臺北：群學出版社。
- 張翰璧（2011）〈族群政策與客家產業：以新馬地區的客家族群產業為例〉。《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289-314。
- 張翰璧、張維安（2005）〈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以中央大學馬來西亞客籍僑生為例〉。見蕭新煌主編《臺灣東南亞學刊》2（1）：149-182。
- 廖建裕（Suryadinata, Leo）（1993）《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_____（2007）《印尼原住民、華人與中國》。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 _____（2008）《東南亞與華人族群研究》。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 蕭新煌 (2011)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見蕭新煌主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3-29。
- 蕭新煌、林開忠 (2006) 〈東南亞客家認同的形成與侷限〉。見丘昌泰主編《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第一屆臺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頁1-23。
-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 (2005) 〈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185-219。
- 羅素玫 (2012) 〈日常飲食、節日聚餐與祭祖供品：印尼峇里島華人的家鄉、跨文化飲食與認同〉。《中國飲食文化》8(2)：1-42。

- Barth, Fredrik (1993) *Balines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 Margaret (2009) "Chinese New Year in West Kalimantan: Ritual Theatre and Political Circu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3: 106-142.
- Coppel, Charles A. (2002) *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 Geertz, Clifford (1980)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na, Willard A. (2004(1976) *Bali Chronicles*. Singapore: Periplus.
- Heidhues Somers, Mary F.(1996) "Identity and the Minority: Ethnic Chinese on the Indonesian Periphery." *Indonesia Circle*, 70: 181-192.
- Salmon, Claudine and Myra Sidharta (2000) "From Skipper to Deified Ancestor: The Worship of Kongco in East Java and Bali (18th-20th Centuries)." *Asian Culture*, 24: 1-25.
- Sidharta, Myra (2005) "The Hainanese in Bali: a Long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 Leo Suryadinata(ed.) *Chinese Indonesians: State Policy, Monoculture, and Multicultur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pp. 69-81.

- Sidharta, Myra(2005) "Old Recipes, New meals,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 in Indone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Symposium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November 11-13,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 Sidharta, Myra and Claudine Salmon. (2000) "The Hainanese of Bali, A Little known Community." *Archipel*, 60(4):87-124.
- _____ (1999) The Hakka Gold Miners of Kalimantan After the End of The Kongsu Era.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54: 83-92.

中評社 (2012) 〈廣東梅州走出的印尼首位客籍華人將軍〉。5月17日。

網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1/1/1/102111132.html?coluid=49&kindid=974&docid=102111132>。 (2012/9/15)

印尼星洲日報 (2011) 〈印尼華人文化公園·林聯興、鄭年錦捐贈19億〉。5月23日。

網址：<http://www.sinchew-i.com/indonesia/node/24357>。 (2012/9/18)

客居他鄉

東南亞

客家

族群的生活與文化

羅素政

004. 〈主編的話〉 ◎林開忠

專題演講

008. 東南亞視角下的東南亞客家研究 ◎顏清滢
018. 從臺灣客家經驗論東南亞客家研究的比較視野 ◎蕭新煌

第一篇：客家宗教

026. The Thatung Performance in Cap Ngo Meh
(Lantern Festival) in Singkawang,
West Kalimantan-Indonesia ◎M. Ikhsan Tanggok
048. 客家人與馬來西亞仙四師爺信仰的關係：
以吉隆坡仙四師爺宮為探討中心 ◎張曉威

第二篇：客家領導階層與社團

064. Towkays and Men of God: Hakka Leadership in North
Borneo before 1963 ◎Danny Wong Tze Ken
082. 荷印棉蘭華人族群社會與領導階層 ◎黃賢強
102. 走過移民崎嶇路的社團：
曼谷客家總會與山口洋地區鄉親會之比較 ◎利亮時
114. 從「客幫」到「客屬」：
以越南胡志明市崇正會館為例 ◎林開忠
132. 印尼峇里島華人族群現象：
以客家社團組織為核心的探討 ◎羅素玫



第三篇：客家產業

- | | | |
|------|-------------------------------------|------|
| 158. | 族群內部的祖籍分工：以泰國皮革業為例 | ◎張翰璧 |
| 178. | 國內外政策干預下之族群產業：
越南胡志明市客家產業經營困境之初探 | ◎李偉權 |

第四篇：日常生活中的客家

- | | | |
|------|--|-----------------------------------|
| 190. | 日常、儀式與經濟：
布賴女性的移動敘事與在地認同(1960~2011) | ◎簡美玲
◎邱星歲 |
| 210. | Hakka Identity in Engkilili and Siniawan, Sarawak | ◎Daniel Chew |
| 226. | Being Hakka Brides: A Case Study of Bidayuh Women in a Hakka Village, Sarawak, Malaysia | ◎Elena Gregoria
Chai Chin Fern |
| 242. | Typ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Adaptations of Hakka Diaspora's Settlements in Cosmopolitan Southeast Asia: West Kalimantan case | ◎Johannes Widodo |

第五篇：客家新生代的東南亞研究觀點

- | | | |
|------|---------------------------------|------|
| 256. | 沙巴「客家」華人的形成：
以教會與公會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 | ◎劉瑞超 |
| 272. | 失落的客家男人身影探究 | ◎張容嘉 |
| 286. | 客屬人士的中國-南洋互動：
以饒芙蓉研究為中心 | ◎賴郁如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 / 林開忠編. -- 初版

-- 苗栗縣：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2013.08

305面；23x16公分

ISBN 978-986-03-7668-5 (平裝)

1.東南亞 2.客家 3.學術論文

536.21107

102015123

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

出版者：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發行人：傅兆書

行政執行：吳昌成、徐芳智

地址：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南路6號

電話：037-985558

主編：林開忠

執行編輯：楊忠龍

封面設計：陳淑鈺

美術設計：堤思T.D.S設計工作室

輸出印刷：臺灣身心障礙人福利促進協會

2013年8月 初版一刷

ISBN：978-986-03-7668-5 (平裝)

GPN：1010201561

定價500元

(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本書著作財產權為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所有，另本書係彙編「2012東南亞客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之發表論文及專題演講內容，不代表本中心立場。